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十四期
2012年4月，頁39-78
國立台灣文學館

烽火下的理想家國造象

——從謝雪漁戰爭小說看東亞論下理想家國形塑及其認同問題探討

薛建蓉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東亞」不僅是個地理空間，更是從歷史、文化角度被賦予的概念。這個概念最初的賦予者正是日本。現在提到「東亞」，除了現代文學跨界的面貌之外，多存留著以「歐洲」為對立面，並且聯想到戰爭期的日本，整體朝向負面的、侵略的，與帝國主義意識型態連結的樣貌。因為「東亞」問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時，以日本為亞洲霸權中心的侵略問題。本文在前行研究的基礎下，將戰爭期（1937年）討論「大東亞共榮圈」理論的時間往前推演，試著理解在「大東亞共榮圈」提出以前，是否有類似的觀念出現？這個觀念的意涵是什麼？本文從《台灣日日新報》的社論看日本「東亞論」的提出和實踐，試圖從《台灣日日新報》所報導者，觀察這個觀念在台灣的推展歷程，並以台灣文人謝雪漁改寫自日本戰爭史的兩篇小說，理解謝雪漁如何在小說中詮釋此觀念，並以此概念形構出一個人人歡喜理想家國。而這個理想家國的形象，正是日本對支那、朝鮮等亞洲國家形構的一個消除國界，建構理想家國的東亞論，進而再從中探討謝雪漁可以迅速認同日本政權的原因。

關鍵詞：謝雪漁、歷史小說、戰爭、東亞論、〈三世英雄傳〉、〈新蕩寇志〉

Creating the Image of an Ideal Country during Wartime:

Image of an Ideal Country in the East Asia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r Novels by Hsieh Shueh-Yu and the Investigation on Identification-related Issues

Hsueh Chien-Jung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East Asia" is not only a geographical space, but also a concept developed from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This concept was developed by Japan. In addi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ture, the current studies concerning East Asia usually are the opposition of the Europe,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negative, aggressive, and imperialistic ideology of Japan during wartime because East Asia-related issue is the invasion of Japan as the center of Asian hegemony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y before the rise of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during wartime (in 1937),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ether similar concepts were proposed before it was developed and the meaning of this concep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oposi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East Asia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itorial of Taiwan New Newspaper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his concept in Taiwan. Moreover, this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how the Taiwanese literati, Shueh-Yu Hsieh, interpreted this concept in his two novels rewritten based on Japanese war history and created the image of an ideal country that everyone loves. The image of this ideal country is exactly the

idea of the East Asia theory where Japan suggested that the national boundaries between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Korea, should be eliminated to construct an ideal country. This paper further probes into the reason that Hsieh could rapidly identify himself with Japanese political power.

Keywords: Shueh-Yu Hsieh, Historical Novel, War, East Asia Theory, “Legend of Heroes” in Three Generations, “New Japanese Invaders”

烽火下的理想家國造象

——從謝雪漁戰爭小說看東亞論下理想家國形塑及其認同問題探討

一、前言

今日我們提及「東亞」一詞，除了指涉的是地理空間的範圍，[1] 或文學、文化的跨界之外，很容易聯想到戰爭期的日本，並朝向負面的、侵略的，與帝國主義意識型態連結的樣貌。因為「東亞」牽涉的問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在亞洲實行的霸權擴張概念。所以，「東亞」是個地理空間的概念，也是一個政治、文化與價值判斷的概念。

目前「東亞」的研究成果，以戰爭期「大東亞共榮圈」研究為多。[2] 而東亞概念下所關注的日治時期作家，又多集中在西川滿、龍瑛宗、張文環等日人作家或新文學作家為主。[3] 然而，筆者有意將「東亞」議題討論的時序，從戰爭期（1937年）往前推演，試著觀察在「大東亞共榮圈」言論出現前，台灣是否也有類似的概念宣傳？[4] 筆者先從《台灣日日新報》來觀察東亞論在台灣刊載的狀況，以及東亞論提出的論點為何？接著，筆者特別以謝雪漁改寫日本戰爭史的兩篇長篇小說做為討論對象，希望藉由小說的內容，進一步理解傳統文

1 東亞在地域上的範圍，多指中國大陸、朝鮮、日本與西南諸島，及台灣等區域。包含渤海、黃海、東中國海、台灣海峽等海洋。松浦章著，卞鳳奎譯，《東亞海域與台灣海盜》（台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2008.11），頁2。

2 關於「東亞」的先行研究，按照出版年代排列如右：1. 史桂芳，《「同文同種」的騙局》（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12）。2.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06）。3. 柳茂坤、鍾慶安，《「大東亞共榮圈」之夢》（中國山東：海南出版社，2006.06）。4. 林慶元、楊齊福，《「大東亞共榮圈」源流》（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11）。5. 米慶余，《近代日本的東亞戰略和政策》（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08）。6.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稻鄉出版社，2010.06）。

3 關於「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文學方面的研究成果：（1）王惠珍，〈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虛與實：以龍瑛宗的文藝活動為例〉，《台灣學誌》創刊號（2010.04）；（2）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稻鄉出版社，2010.06）等為代表。

4 在本文中將「大東亞共榮圈」概念提出以前，與其概念相似，也以建構「東亞」共同體為方針的概念統稱為「東亞論」。另外，本文統一使用「台」字，除非有需要，不然不特意改為「臺」字，以下皆同，不再另述。

人謝雪漁如何詮釋日本歷史上的戰爭？而又如何在小說中詮釋東亞論？並從中剖析傳統文人的謝雪漁，之所以能快速接受日本新政權，與日本推行東亞論之間的關係。筆者為什麼會以謝雪漁為探討對象？筆者的考量有二：首先，本文主要以《台灣日日新報》做為理解「東亞論」在台宣傳的報刊，若能同時從任職《台灣日日新報》「記者」的言論來理解該觀念的宣傳成效，與詮釋的樣貌，更可以理解台灣人對東亞論接受的程度。另一個方面是，筆者考量先行研究對東亞論的關注，多集中於台灣新文學家或日人作家，若要觀察1920年代以前台灣文人對東亞論的接受狀況，筆者認為應從傳統文人著手。因此，本文研究對象鎖定了生命歷程跨越清、日與國統時期，又曾經在《台灣日日新報》擔任記者的謝雪漁，期待從其小說書寫觀察出他對東亞論的接受與實踐，甚至藉此理解謝氏為何在日本統治台灣之初就能迅速接受日本政權的原因。

二、「東亞論」在台的宣傳與實踐

「東亞」一詞的崛起與日本企圖成為亞洲霸權中心的問題有關，子安宣邦曾指出：

> 一九三〇年代，帝國日本要求「舊有以歐洲為主的世界秩序應該加以重組」，提出（日本）帝國主義式政治論的「東亞」概念。[5]

上述說明東亞的問題約在三〇年代受到日本的關注，而其發展與反歐洲中心有關。為何與反歐洲中心有關？當時世界籠罩著歐洲中心論，歐洲被視為「歷史的創造者」，是進步的、現代化的代名詞。歐洲以外的地區則是進步緩慢的，停滯不前的，需要歐洲文明拯救的。[6] 而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想要扭轉過去歐洲中心的觀點，因此提出東亞論。所以，東亞論是個相對於歐洲，具有挑釁、對

5 子安宣邦指出討論東亞的書籍皆在一九三〇年代之後出版，可見日本在三〇年代之後掀起一股討論「東亞論」的熱潮，其舉列者有：和田清，《東亞史論叢》（日本東京：生活社，1942）。金山正好，《東亞佛教史》（日本東京：理想社，1942）。秋山謙藏，《東亞交涉史論》（日本東京：第一書房，1944）等。參考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頁11。

6 J.M.布勞特著，譚榮根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1。

抗性的觀點。為何在三〇年代以後會掀起東亞論的討論熱潮？筆者認為這與三〇年代「大東亞戰爭」爆發有關，當時日本為了有效動員東亞他國的翼贊力量，而極力呼喊「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7] 雖說先行研究顯示「大東亞」的論點在三〇年代以後興起，但是筆者在閱讀《台灣日日新報》時，發現在三〇年代以前的台灣報紙已經充斥著「東亞」這個名詞。如

> 懸知東亞鼓文明，畫舫秋風破浪行。詩草氤氳薰竹邑。筆花爛漫節榕城。未伸驥附四方志。徒〇鴻歸萬里程。摯友舊師相晤處。憑君為道倦懷情。[8]

黃守謙[9] 這首〈送潤庵詞兄之福州〉作品提到文明之風正在東亞內飄揚。筆者引述這首送別之作，是為證明「東亞」一詞在當時報刊已可見。

最早「東亞」的概念，與日本的亞洲主義有關，因此在追溯台灣報刊的「東亞論」概念以前，必須先爬梳日本的亞洲主義。日本的亞洲主義興起的時間約莫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前半葉。[10] 當時江戶時代日本儒學家一直存在著以中國為世界中心的觀念。到了十八世紀末西洋的天文與地理技術改變了世界的面貌，日本這時才意識到「西洋」的存在，過去以中國為中心的觀念便開始鬆動。[11] 明治維新以後東亞問題的討論，便出現兩種聲音：一是以1885年福澤諭吉（1835-1901）提出的「脫亞入歐論」[12]，另一個是1903年岡倉天心（1863-1913）為代表的「亞洲一體論」。[13] 兩個論點提出的時間不同，影響

7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頁21。

8 黃守謙，〈送潤庵詞兄之福州〉，《台灣日日新報》5472號，1915.09.15，6版。本文在引文中若出現「〇」是表示未能辨認的文字，以「口」則表示該文字模糊待辨認，以下引文用法皆同，不再贅述。

9 黃守謙（？-？），字式垣，桃園人，日據時期曾任台灣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教諭，並受賜佩紳章，為地方士紳。參見《黃氏族譜》（來源 http://192.192.13.178:8088/html_show.php?sn=375&open_sn=384#top，2011.08.07）。

10 葛兆光，〈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關於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03），頁186。

11 同上註，頁186。

12 福澤諭吉，〈脫亞論〉，《時事新報》，1885.03.11。轉引自《福澤諭吉全集・第八卷》，（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59），頁427。

13 岡倉天心（1862-1913）：橫濱人，近代日本思想家、美術教育家。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1903年以英文寫下《東洋的理想》一書，文中對亞洲文化精神進行了獨特的概括，並提出「亞洲一體」的概念。岡倉天心，《東洋的理想》，《近代日本思想大系7・岡倉天心集》（日本：筑摩書房，1976），頁10。另可見註7，頁36。

的層面也不同，最初以福澤諭吉的影響為重，其論點為：

> 我日本國土在亞洲東部，但國民之精神已經擺脫亞洲的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為今日謀，我國不能不等待鄰國之開明，一道振興亞洲，與其脫離其伍而與西洋文明國度共進退，還不如接引支那、朝鮮…[14]

這種以日本為領導亞洲近代化文明龍頭的企圖，在明治維新時左右了對中（包括台）、韓的政策。[15] 到了日俄戰爭成功之後（1905年），便發展為日本領導亞洲成為霸主的野心。[16] 這個野心甚至左右了日本民族主義的擴張，以及對抗西洋強勢侵略的意識。福澤與岡倉主張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是以東洋與西洋彼此的認同作為基礎；後者則是以東洋與西洋文明的差異作為基礎。前者主張擺脫亞洲的「惡友」，希望迅速進入歐美列強的行列；後者認為亞洲為世界提供了歐洲文明所無法提供的「愛」和「美」，在這個前提下，亞洲具有歐洲文明無法企及的價值。[17] 儘管一個想進入歐洲列強行列，一個強調亞洲文明勝於歐洲文明，兩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亞洲一定能與歐洲相抗衡。

福澤、岡倉的論點與子安宣邦前面提到三〇年代日本興起「以歐洲為主的世界秩序應該加以重組」的說法也有不謀而合之處。正確來說，福澤諭吉與岡倉天心提出「脫亞論」與「亞洲一體論」，甚至三〇年代日本興起「以歐洲為主的世界秩序應該加以重組」的說法，實際上都是以日本為亞洲中心，企圖取代過去亞洲以中國為中心所建構出來的概念。

1895年領台以後，台灣成為日本東亞的殖民地。[18] 日本的東亞論開始在台灣的報章雜誌上已得見。而此時所指的「東亞」地理範圍，筆者從《台灣日日

14 福澤諭吉，〈脫亞論〉，《時事新報》，1885.03.11。同註12，頁427。

15 「東亞論」的提出主要是從日、中、韓三國的連結關係為出發點，福澤諭吉和岡倉天心等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台灣仍屬於中國的領地，筆者在此強調，往後內文裡會以「中（包含台）」這樣的書寫出現，用法以下皆同，爾後不再贅述。

16 日俄戰爭的勝利，對日本來說是戰勝歐洲的一個指標性勝利。當時俄國是個腹地廣大的帝國，屬於白種人，對日本人來說他們是屬於歐洲人種之一，因此日俄戰爭之後，日本企圖帶領亞洲各國，戰勝歐洲的行為便更積極。另外福澤諭吉提出日本為亞洲盟主的觀念，參考葛兆光，同註10，頁187。

17 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台北：巨流出版社，2001.09），頁26。

18 〈台灣の前途〉，《台灣新報》269號，1897.08.03，2版。

新報》上〈協商保韓〉一文所提到的中、日、韓推測，中（清國）、韓、日應該是日本初步認定的「東亞」範圍。[19]

筆者再從《台灣日日新報》的社論來看日本如何在台灣傳播他的「東亞」政策。在〈弭兵會議〉一文中提到「俄帝，提出萬國平和會議，于和蘭之首府海牙，本月十八日開會，此事世疑之多者矣。歐洲列強對東亞大陸舉動與平和會議之精神，全相矛盾，此所謂假仁義也。」[20] 文中對萬國和平會議關注東亞問題提出質疑，並且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反對歐洲關注亞洲的問題。從這裡可以看出東亞問題在當時已非亞洲內部的問題。

日本在領台後，對於「東亞」的政策開始有了實際的行動。明治30年（光緒23年，1897）由陸實、三宅雄二郎、犬養毅、池邊吉太郎、平岡浩太郎、江藤新作、安藤俊明、香川悅次、井上稚等29人組成「東亞會」，以研究清國時局為目的，並邀請正在中國鼓吹變法的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康廣仁（1867-1898）入會。另外，還組織一個以啟發中國人、匡救東亞時局為宗旨的「同文會」，由日人井手三郎、岸田吟草、宗方小太郎、中島真雄等人所倡導。光緒24年（1898）底，東亞會與同文會合併為「東亞同文會」，並請近衛篤麿擔任會長，並於福州、長沙、重慶、南京和襄陽等地設立支部，在東京創刊《時論》，在上海創刊《亞東時報》的雜誌，每月發行。並且也同時成立同文會支會為作為中、日國的教育機構。[21] 光緒26年（1900），東亞同文會在南京成立「東亞同文書院」，招收日本與中國學生。「東亞同文會」成立目的在於協助清國改善時政，以共同保存東亞之同文文化。[22] 筆者考察《台灣日日新報》關於「東亞同文會」的新聞，有篇〈招宴幹員〉，該文是整理東亞同文會會員國友重章等人對東亞同文會的建議，文中表示若同文會會

19 〈協商保韓〉，《台灣日日新報》17號，1898.05.25，1版。
20 「和蘭」是當時的翻譯用語，指今日的「荷蘭」。〈弭兵會議〉，《台灣日日新報》，1899.08.25，3版。
21 《台灣日日新報》134號，1898.10.12，3版。該文顯示「東亞同文會」並於1899年梁、康等人被捕入獄時，由日人會員上書給日本總理大隈重信搭救梁啟超等人。
22 《台灣日日新報》160號，1898.11.13，5版。

員能通曉中、韓兩國語言，對於東亞形勢瞭解很有幫助。[23] 這裡藉由向會員宣傳學習中、韓語言的重要性，可見當時「東亞論」建構的基礎是以保存東亞同文文化為主。所以相當重視「語言」溝通，尤其是日本能與中國、韓國溝通的語言，這裡也呈現東亞是以中、日、韓三國為主要地域範圍。1899年廈門也成立「東亞書院」，《台灣日日新報》刊載〈廈門東亞書院章程〉，文中更強調語言文字對於建構東亞的重要性：

> 時值今日萬教紛如航海梯山跡徧東亞，保教保種之議，尤不容緩。今擬創書院其效有四：夫以亞細亞之大為全球所重，中日唇齒相依，宜早聯洽，以固邦基，以端教民。夫欲籌聯洽之策，必自語言文字。[24]

文中首先提出中、日兩國地理位置相近，為保存亞洲的宗教、種族必須進行聯合政策，而執行政策的方式以能相互溝通的語言文字為首要。從上述兩則訊息得知，對日本而言「東亞同文會」是在建構東亞共同體的基礎下，以培養精通東亞各國（中、日、韓）語言的人才為目的。[25] 筆者在《台灣日日新報》內見到有關東亞書院開會、課題寫作或課題徵文的訊息，筆者發現東亞書院之所以中、日參與者眾，加上營運毫無遭受到中國內亂外患影響，可見「東亞」概念的推展，到東亞書院創校等事，對日本來說，不僅是培養與東亞各國溝通的人才，對中、日知識分子來說，更提供了交流的園地。[26]

爾後，「東亞」概念在《台灣日日新報》有多面向的討論。明治34年（1901年）長岡護美在《台灣日日新報》發表〈中國國民教育論〉一文，文中

23 根據東亞同文書院前四期學生的調查報告集結編成的《支那經濟全書》研究得知，實際上，東亞同文書院為一訓練日本特務的機構，最大的成就在於分派畢業生至中國各地調查。《台灣日日新報》188號，1899.08.09，5版。

24 《台灣日日新報》488號，1899.12.16，3版。

25 儘管東亞書院從建校到營運，歷經了遷徙、中國內戰等變故，一直到1937年遷移到長崎仍再營運了兩年，可見，日本在經營東亞書院，且透過書院推展中、日共融和上不遺餘力。本文中關於東亞書院的資料，筆者參考李弘祺編，《中國與東亞的教育傳統》（台北：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6.06）。

26 關於參與東亞書院中、日人士資料，以及中國人對東亞書院的看法，可參見註25。

指出中國與日本同文同種，雖人情、風俗各異，但地理位置唇齒相依。[27] 該文指出中國送留學生出國學習專門教育之前應先加強基礎教育，從中可推知兩件事，第一、日本當時相當關心中國的時政與教育問題，另外就是中國與日本為同文同種的言論已經開始出現。

明治36年（1903年）不著撰者所著〈亞細亞大同盟論〉一文，更強調日、清、韓應儘速聯盟，聯盟後需先解決清國內部，再來解決亞細亞整體的問題，以對抗歐米侵亞的勢力。[28] 明治40年（1907年）岳洋譯〈東亞の現勢〉[29] 點出清國、俄國與蒙古民族之間的問題。大隈伯談屑（大隈重信（1881-1938））以〈支那民族之將來〉為題也發表一篇短文，文中從七個方向來談支那的未來，包括各國對支那的進軍、日本與支那的關係、袁世凱執政、歐美駐支那之行為、對支那現況診斷與支那前途的推測等。這篇寫作目的在於解釋日本增兵支那的原因，還有說明日本與支那在地理位置，與經濟上密不可分的關係，另外，文中也反對歐美在支那的作為，並要求支那立即改善現況。[30] 本段提出的三篇文章，內容均說到日本對周邊國家（中、韓）的時政與日本的關係，包括地理位置上的唇齒相依，歐米侵亞影響東亞時局等問題相當關注。令筆者好奇的是，為什麼日本為什麼特別關心中國時局？筆者引述一段話來詮釋上述三篇文章的看法從何而來：

> 歐洲戰局於我東亞地位。所有影響，彌見複雜。今後視局面，如何展開，帝國政府，或當與支那政府，妥為商議。不獨支那不利而於東亞大局，影響尤大。[31]

上述表示世界時局對東亞各國的影響甚大，尤以中國政局變化對東亞形勢影響為最。從這裡可以得知，在《台灣日日新報》中的東亞論，主要關懷對象是放

27 《台灣日日新報》1513號，1901.11.03，5版，和《台灣日日新報》1514號，1901.11.05，5版。
28 《台灣日日新報》1682號，1903.12.09，1版，和《台灣日日新報》1683號，1903.12.10，1版。
29 岳洋譯，〈東亞の現勢〉連載在《台灣日日新報》上，於明治40年（1907）4月27日至5月3日分3次刊載。
30 大隈伯談屑，〈支那民族之將來〉，《台灣日日新報》4239號，1912.03.18，3版。
31 不著撰者，〈支那時局與帝國〉，《台灣日日新報》6312號，1918.01.20，6版。

在中國身上。而且從「東亞書院」等推動中國文明化和維護其政權獨立的舉動，更可推測日本想幫助支那獨立，免於西方他國的侵略，主要還是站在維護自己利益的基礎上。從這個角度對照復堂所作、濤樓翻譯的〈支那分割之運命〉一文，就可以理解日本建構「東亞論」的理論基礎：

> 支那者二十世紀之謎也，能解得此謎者，可以為東亞之霸，可以為五洲之雄，不知解謎之鍵果何物。[32]

文中表示若能理解支那者，必定可以稱霸東亞。所以，日本會將東亞論的焦點先放在支那，實際上是藉由關心支那時局來掌握整個東亞的局勢，這時日本東亞論想要左右東亞各國政權的企圖已經昭然若揭了。

從上述的社論中，得知日本對東亞的目的後。日本又該如何提出自己與中國同文同種的證據，拉近中、日關係。考古學博士濱田青陵（濱田耕作（1881-1938））從考古學的角度，證明了日本與支那的淵源：

> 東亞文明之起源，以支那為中心，與其東方接壤之朝鮮半島，及日本群島，其地勢關係，古來成一文化的團體。其文明之起源，近時考古學、史學、言語學諸學問，進步發達，從事是等學術之學者努力研究。雖漸明其源，然欲得十分結果，尚須待諸將來。惟科學的立腳地，所得已不少，今日由貧弱資料之假定的學說，漸得豐富之證據，今試言其概。[33]

濱田青陵解釋東亞文明的起源是以支那為中心，從中建構東亞具有共同基礎的概念。[34] 他從支那的石器時代開始追溯起，從石器的演變、分佈的位置，看出支那石器在東京、朝鮮北部分佈的狀況。[35] 從考古學來詮釋東亞各國間的連

32 復堂著、濤樓譯，〈支那分割之運命〉，《台灣日日新報》5629號，1916.02.28，3版。（於1916年2月29日改名為〈支那之運命〉）連載到同年8月30日，共刊載65回。

33 文學博士濱田青陵（濱田耕作（1881-1938）考古學家）述，〈東亞文明之起源〉，《台灣日日新報》，1922.02.03，6版。該文分十次刊載，從大正11年（1922）2月3日刊載至大正11年2月21日。後來在昭和5年（1903）由刀江書院出版，書名為《東亞文明的黎明》。

34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頁9。

35 〈東亞文明之起源〉（七），《台灣日日新報》7801號，1922.02.17，6版。

結，證明日本與支那、朝鮮共同的文化基礎，以推測支那人種移居朝鮮與日本的痕跡。[36] 這不僅透過同文的連結劃分出我與他者的邊界，也為東亞各國的結盟提出堂而皇之的證明。

由此歸納來看，從日本境內「東亞」概念的形成，到領台時《台灣日日新報》中刊載關於東亞論的社論來看，日本東亞論建構的時間大約與岡倉天心1903年提出「亞洲一體論」的時間點相近，甚至在提出東亞概念之時，就陸續在《台灣日日新報》刊載相關的社論。從東亞論在日本形成的歷程，以及在台灣傳播的內容，筆者歸納東亞論具備三大特質：（一）是東亞是個地域的概念，是以支那朝貢國日本、支那和韓國等為主要涵蓋範圍。（二）「東亞」是建構在「同文（漢文）同種」的基礎下，發展出來解消彼此國家界線，團結彼此的立場。（三）「東亞」概念的建構是站在結合東亞各國勢力，以對抗西方侵略為主要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強調的「東亞論」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時提出的「大東亞文學」觀點不同。筆者認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召開與「大東亞共榮圈」的建構有直接的關係，雖然與本文提出的「東亞論」概念不能斷然切割，但不能將二者直接劃上等號。怎麼說呢？從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論」到宮崎滔天的「大亞細亞主義」，[37] 到後來形成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李文卿表示這些概念彼此有其連結關係。日本自明治維新以降，在國力漸增強，以及恐懼西方勢力東漸的狀況下，發展出上述的理論，因此這些理論均具有以防禦視野為根據建構而成的亞洲共同體說，其中也隱含具侵略性的日本中心論。而且，在侵略論形成後，便發展成三

36 〈東亞文明之起源〉（九），《台灣日日新報》7804號，1922.02.20，6版；〈東亞文明之起源〉（十），《台灣日日新報》7809號，1922.02.21，6版。

37 大亞細亞主義（The Great Asianism）亦稱泛亞洲主義（Pan- Asianism），它是對泛歐洲主義的模仿，同時也對是泛歐洲主義所透露的白人優越意識以及侵略行為的反抗（王屏，2004：3-4）。基本上，大亞細亞主義是日本帝國的論述，日本學界慣稱為大アジア主義。至於1924年孫中山在神戶所做的「大亞洲主義」演講，其內容與目的都在與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對話。儘管「大亞細亞主義」與「大亞洲主義」在字面上的意義並無二致，然而從其提出的時機與內涵來看，無疑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論述，為求區別，本文一律以「大亞洲主義」一詞指涉孫中山的亞洲民族大同思想，「大亞細亞主義」則專指日本帝國意圖獨攬亞洲霸權的論述。趙勳達，〈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在台灣的興起與發展概況（1924-1937）〉，《國家發展研究》10卷2期（2011.06），頁79。

〇年代日本侵略論的根據。[38] 因此筆者認為上述所提的概念箇中有其關連，但仍有些許的差異。

如果說「大東亞共榮圈」是以實踐日本大東亞建設為最終目的，其形成的內涵又與上述提出種種概念有關，而筆者先前爬梳的東亞論也源自於這些概念，二者形成的歷程似乎很相近，不過若以「大東亞共榮圈」文學協力的目標來對照本文所提的「東亞論」，便可凸顯二者的差異，其主張：

> 一、皇國史觀與日語教育的強化：日本在「大東亞共榮圈」實施「國語」政策，藉以推展日本國民共同體意識。
>
> 二、文學內容強調行旅與戰爭，遊記、戰爭文學中所含有的冒險精神與文學趣味，開啟了日本文學的另一個面向。

從上述來看，「大東亞共榮圈」推展的文字以及文類，是與宣揚日本國體跟美化戰爭形象有關。[39] 筆者對照二者的差異如下：（一）在「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時，不再宣揚日、支、朝鮮之間的血緣連結與同文關係。（二）「東亞論」使用的文字是漢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則改為具有皇國史觀的日文，

38 同註7，頁39。侵略論尤以石原莞爾在戰爭期所提的「東亞聯盟論」是推動的關鍵。「東亞聯盟論」是三〇年代日本的法西斯帝國主義的理論，「東亞聯盟論」呼應了「大亞細亞主義」的主張，在「亞洲一體」的口號下，不僅建構政治的擴張體系，同時含括了文化層面的建設，以實現八紘一宇的亞洲共同體作為最高指導原則。大亞細亞主義中所鼓吹之排除歐美勢力的「亞洲人的亞洲」與「大亞細亞主義」作為理論，到了「東亞聯盟論」有了具體的體制構想。他提出「共同國防」、「經濟一體」、「東亞新文化」等方針，並於1938年5月提出對東洋的看法，他以「道義」、「王道」做為東亞文化建設的文化基準，藉此將國家之間的利害關係以及民族間的差異抹消，全都收編為一體，而將此文化成為民族間共有的資產，以實踐共存共榮之理想。亦即，他期待從文化建設著手，訴諸「德」與「道義」，將武力戰爭對立過渡到共有「文化」的解釋上，以消弭緊張的對立態勢。值得注意的是，石原莞爾的「東亞聯盟論」的文化建設體制僅設定日、滿、支三國的文化融合，其目的是將日、滿、支三個地域建構成同一文化圈，以東亞文化作為建構理念，以進行文化收編和順利完成在中國戰事的勝利，但是，朝鮮與台灣並未涵蓋在其中。李文卿認為，最可能的解釋是當時朝鮮與台灣尚屬日本的殖民地，其文化組成應以日本文化為皈依，所以不需要特別標舉。「東亞聯盟論」在1939年10月成立，並發行機關雜誌《東亞聯盟》。因為東亞聯盟主要訴求是一種文化運動，是一種聯合東亞的文化運動，朝著日支提攜的方向前進，並尋求中國的支持，共同與日本建立東亞。到了1940年歐美戰線的展開，東亞聯盟的政治色彩日漸強化。同年，「大政翼贊會」的成立落實了東亞文化體制的推動。

39 李文卿表示：「透過文學者戰爭文學之刊行，一方面將日本軍士英雄化，同時也將此戰事神聖化，為國家機器的最佳掩護與宣傳，戰爭期的『筆部隊』是文學者翼贊體制中與戰爭的動態最緊密連結的動員，同時也是軍方重要的隨戰宣傳力。」筆者根據李文卿的研究成果，對照目前看到的「東亞論」以及談論「東亞論」的小說，認為「東亞論」提出時，並沒有特意以戰爭、遊記文學作為號召。同註7，頁109。

漢文被迫退場。三、在「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後，行旅、戰爭類文學被大肆推廣，但是「東亞論」在台宣傳時，以目前可見資料，筆者並沒有看到有哪一類型的作品特意在「東亞論」下被推廣。[40] 筆者認為無論是「東亞論」到後來發展成的「大東亞文學」論，這些以日本本位主義出發的言論，除了文字使用工具的意義不同，以及同文同種言論消退之外，基本上東亞論與大東亞共榮圈的本質仍是為建構以日本為亞洲中心的目標為主。

是故，不論是日人或台人提出的「東亞」、「支那」關懷，足見日本實際上在領台時，就有意在台建構東亞論。筆者以為這是日本將台灣視為中國與日本連結的轉運站，更可以視為殖民宗主國合理化殖民地台灣不可或缺的論點。上述筆者先以報刊傳播的內容，瞭解東亞的概念以及傳播給台灣讀者的內容。緊接著筆者以上段歸納出來東亞論的三大特質，嘗試從台灣文人謝雪漁的小說作品來觀察，謝雪漁如何在小說中詮釋東亞論。

三、〈三世英雄傳〉與〈新蕩寇志〉故事敘述及其東亞論意涵

上節呈現東亞論在《台灣日日新報》刊載的內容，筆者認為東亞論在當時應該是個頗受關注的議題，以下從《台灣日日新報》記者謝雪漁的二篇小說，來理解謝雪漁對東亞的接受與詮釋。

（一）謝雪漁生平及身分簡述

首先，筆者試著以謝雪漁的生平來推測，他為何會對東亞論有興趣？以

40 筆者書寫本文時，爬梳報刊中「東亞論」在台宣傳的言論與小說時發現，有關戰爭類型的文學作品的確是比較容易在文中融入「東亞論」的思想。但是，筆者爬梳在台宣傳「東亞論」概念時，並沒有特意推廣某一類型的文學作品。關於「東亞論」宣傳下的文學作品類型，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推廣下的文學作品類型比較，筆者擬專文討論。

及本文為何要以謝雪漁為討論對象？謝雪漁（1871-1953）[41] 其一生受到清、日、國民政府三個不同政權的統治，又在台灣主流媒體工作，並和日本執政者交好，更重要的是，很多重量級的漢詩社活動他都參與其中。這是筆者之所以挑選謝雪漁為研究對象的原因，其多重身份讓人不禁好奇他是如何在其中轉變他的文化認同。

而且，謝雪漁曾在〈入報社誌感〉一文中提出「喝破舊時陋習，以漸進文明之域」，[42] 甚至其後在〈記者論〉中又表示「然余為記者之主義，在乎文明事物，已略有所知者，為紹介於社會同胞，稍盡幾分義務，不在於責善。」[43] 這兩段話呈現謝雪漁面對「記者」這個職業的想像與期待，甚至可以說謝雪漁對文明的接受與其職業走關，也是他對「記者」這個身分，所擔負之社會責任的理解。所以，筆者想瞭解謝雪漁對東亞論這個新思想的看法。另外，曾是中國子民的他，在接受新統治者統治時，必定有無法拋棄過去國族的痕跡，而這個痕跡是筆者推測他之所以能接受東亞論的原因，也是他可以迅速認同新統治的原因。因此筆者試圖從他以日本歷史改寫成的通俗小說中，找到他如何接受一個新的統治者，以及他在小說中詮釋東亞論的脈絡。

41 謝雪漁，本名謝汝銓，字雪漁，筆名常署為：雪、雪漁，晚年又署奎府樓老人。台灣台南人，日治後才遷居台北市。少時從學蔡國琳。1892年（光緒18年）考上台南生員，日治之後入國語學校學習，並入總督府學務課、警察官吏練習所任職。1905年入《台灣日日新報》社擔任記者，1909年3月與《台灣日日新報》同事共組瀛社，並常任瀛社、南社與崇文社等文藝社團的評選、詩、詞宗。1912年2月21日轉赴南洋馬尼拉任《公理報》記者。1912年10月木村匡成立「大正協會」，謝雪漁也參與其中。1916年9月謝雪漁擔任祭祀孔子典禮委員會副會長，並於1918年10月成立東瀛藥種貿易公司。著有《奎府樓詩草》三卷、《詩海慈航》二卷，另有《蓬萊角樓詩存》一卷、《周易二卷略説》等。並常於《台灣日日新報》、《風月報》等報刊發表小説、漢詩和雜文。其生平參見1.《台灣日日新報》1901.04.03，2版。「雜報」：國語學校語學部國語學科卒業生：「去月卅日國語學校の國語學科を卒業せし本島人は八名にして白陳發（台北）、陳貫（台中）、蔡秋江、謝汝銓（以上台南）、劉金波（台北）、廖重光等」。2. 謝雪漁，〈入報社誌感〉，《台灣日日新報》1905.03.07，3版。3.《台灣日日新報》1912.02.23，5版。「雪漁氏送別會」：本社記者謝雪漁氏。將赴馬尼拉視察。稻艋紳士為發起祖餞。去二十一日。假龍山寺為祖餞。歸台時間參考《台灣日日新報》，1912.09.23，4版。「編輯臆錄」（九月廿二日）「謝雪漁氏辭馬尼拉公理報主筆歸台。」在馬尼拉期間寫下〈遊岷里剌紀略〉，並於1913年1月3日分八次連載於《台灣日日新報》。4.《台灣日日新報》，1916.09.26，5版。「木村匡擔任會長，大稻埕區長黃玉階、艋舺區長吳昌才和謝汝銓擔任副會長。」

42 謝雪漁，〈入報社誌感〉，《台灣日日新報》，1905.03.07，3版。

43 謝雪漁，〈記者論〉，《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8.02.02，4版。

（二）〈三世英雄傳〉故事概述及其東亞論意涵

〈三世英雄傳〉從大正元年（1912年）8月24日開始，分19回，110次連載於《台灣日日新報》上，至大正2年（1913年）1月10日連載完畢，小說約刊在第六版。每一回有各自的回目，有「弁言」無序跋。作品刊載之初，謝雪漁仍在馬尼拉任職。[44]該故事一開始就點出其寫作目的：

> 鴻濛既闢，人類遂生，區分為數十百國，蕃衍有幾億萬人，熙熙攘攘，死死生生。◯靈氣所鍾，輒有英雄出乎其間，英雄事蹟，後人每樂道之，以其能為人之所不能為，能為人之所不敢為。然英雄有現世而名即著者，有隔世而名乃彰者。有為正史特書者，有為稗史拾載者，有不幸而二者均不可得，泯滅無聞者。茲得諸傳聞，謂德川幕府末造，明治維新初年，有三世英雄，其人其事，為正史所未書，而言者鑿鑿，似非虛無縹緲，作蜃樓海市之觀，因倣稗史拾載之例，演而出之，以為有其人其事可也。無其人其事亦可也。有無蓋聽聞者之自度耳。[45]

從上述得知，作者是站在補綴歷史的角度，來書寫德川末年未被史書記載的英雄事蹟。他跟過去中國傳統的歷史小說書寫目的相似，都是為了補充、修正史書未記之事。小說是以真實的年代為背景，以虛構人物發生的事件為主要情節安排，並以章回分目的方式呈現。這裡運用傳統中國歷史小說書寫模式，並且在每一回之前有各自獨立的回目，來點出該回故事的重點。

故事以主角徐一郎與父親徐士奇遭遇作為故事的開端。徐士奇在一郎小時候就離家前往江戶為幕府工作，當時正值幕府末期，外國商船不斷前往日本要求通商，因此日本境內分成開國黨與鎖國黨兩派，後來徐士奇因協助開國黨而被鎖國黨暗殺。本在江戶與父親團聚的徐一郎在父親死後，只得被遣回故里。之後，鎖國黨勢力漸衰，開國黨要求德川幕府大政奉還，明治天皇接政後，推

44 《台灣日日新報》，1912.09.23，4版。「編輯賸錄」（9月22日）「謝雪漁氏辭馬尼拉公理報主筆歸台。」

45 雪（謝雪漁），〈三世英雄傳〉「弁言」，《台灣日日新報》，1912.08.24，6版。

動維新，招考青年赴海外擔任海陸軍留學生。徐一郎欲為國效忠，並考上陸軍前往德國深造。赴考之際，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田川思明、徐克忠等人，一同前赴德國留學。

之後的故事分成雙線進行，一邊寫日本境內國事，如江戶改制成東京，其言：「江戶是將軍開府之地，今則改為東京，是天子之居。」[46] 還有，當時日本與韓國外交關係的政策，本來日本決定再與韓國建交，但是韓國卻拒絕，因而西鄉隆盛等鼓吹征韓，進而日本內部引發征韓與否的論爭，最後西鄉隆盛等人主張失敗，被迫辭官回到故里之事。[47] 另一線則放在故事主角徐一郎、田川思明等日本留學生在歐洲的生活，如在博物館前赤手打虎，或者徐一郎又與中國留學生鄭繩祖，一同在歐洲的比武大會上，以武術和體力戰勝他國，雙方一同獲得金牌等事。小說不但交代日本國事，也描寫了留學生在國外見到的西方文明，與亞洲人種體力與智力均戰勝歐洲人的種種事蹟。故事最後以徐一郎等人結婚、歸國，報效日本；以及一郎、長雄與思明與支那人王大用、鄭繩祖結成知交，其共同為兩國將來聯合努力劃下句點。[48] 若以目前可見的部分來論斷結局，[49] 以日、支融合，兩國留學生皆欲為自己國家盡忠效力並維持中、日兩國和平的結果，這不失為在內亂征戰之後，中、日兩方邦交友好，一同建構一個理想家國景象描繪。

為什麼小說要命名為「三世英雄傳」？應與主角徐一郎和中國留學生鄭繩祖等人的身世有直接關係。主角徐一郎的身世得從父親徐士奇看起：

> 主角徐士奇，號秦餘，世居徐福村。其先世謂是秦始皇時遣徐福入海，求神仙不死藥，福攜五百童男女去，浮弍至日本，見山水明媚，卜居海濱，將童男女配偶，生聚日繁，時童男女既不自知系譜，又以從徐福去故冒姓

46 〈三世英雄傳〉（四五）
47 〈三世英雄傳〉（八十九）
48 〈三世英雄傳〉（六四）
49 謝雪漁在〈三世英雄傳〉19回（百十一）最後一次刊載時文末提到；「是為三世英雄傳前編，尚有許多事跡，載於後編，前編十九回，後編稱是，俟異日錄出。」1913.01.10，6版。但今未見〈三世英雄傳〉後編的刊載。故筆者分析時僅以目前得見的內容論斷。

徐，士奇一家，亦是五百童男女中之所傳，其號秦餘者，示不忘祖也。

徐士奇的祖先，是秦始皇時代與徐福一同前往日本尋找長生不老藥的五百童男童女的後代，之所以姓「徐」是為了不忘其本源。徐福的傳說是過去中、日雙方，解釋彼此血脈是否有所連結的一個重要根據。雖然對徐福的解釋仍有分歧，[50] 但是，謝雪漁將主角身世與中國徐福作為連結，主要是以徐福的傳說來呈現中、日兩國血脈相連的證據。這條證據的使用，不僅出現在主角徐一郎身上，也出現在日本留學生田川思明，以及他們在德國遇到的中國留學鄭繩祖的身世。

中國留學生鄭繩祖是鄭芝龍的十三世孫。[51] 而日本留學生田川思明，之所以叫「思明」，也因為他是鄭芝龍的後裔，鄭芝龍在日本娶的妻子，本姓田川，故留在日本的思明便從母姓「田川」。[52] 另外，他們在德國遇到的一個日本使節朱懷仁，其身世也與明朝遺民朱舜水有關。小說中對於朱舜水的忠義精神，以及他對日的貢獻多所讚許。雖然，朱舜水在日本境內並無娶妻，但是，朱懷仁一族之所以改姓「朱」，是為了感念朱舜水偉大的人格。[53] 小說裡透過中國、台灣歷史人物在日本的後裔，試圖將中、日、台的血脈連結，因為謝雪漁認為：

50 根據衛挺生、王雲五《徐福與日本》一書的內容，關於徐福在日本的傳說有二，一則是「日本開國建立者是否為徐福？」這一點日本人相當反對這個說法。反對者有津田左右吉、家永三郎、藤間太生等日本哲學家與史學家。另一則是徐福是否到過日本，其足跡踏過何處的說法，這個說法倒是出現很多歷史研究者考察證明過。參見衛挺生、王雲五，《徐福與日本》（台北：台灣商務，1974.10），頁25-52。另外，中日雙方對徐福傳說的書籍有：1. 彭雙松，《徐福與邪馬台國》（苗栗：富蕙出版社，1990.06）；2. 三谷茉沙夫《徐福傳說的謎1940-2001》（日本東京：三一書房，1992）；3. 羅其湘《東渡蓬萊第一人：徐福研究文集》（中國北京：燕山出版，1993.06）。4. 楊正光、朱亞非，《徐福文化的思索》（中國山東：友誼出版社，1996.06）；5. 鄭一民、張占方，《徐福千童詩詞集》（中國河北：河北教育，1998.06）。

51 〈三世英雄傳〉（八五）「鄭芝龍曾流寓日本，娶日本豪族翁氏女為婦，生八世孫祖森，我八世祖歸支那，有弱弟尚留日本，未知彼一支有傳人否。而其好友田川思明也是鄭芝龍祖所傳後裔。芝龍祖到日本，所娶者為我第一世祖母，祖母外家姓田川，非翁氏也。森伯祖歸支那，我祖名七左衛門，留田川家，不歸支那。冒姓田川，傳至家父為五世。至我為六世。君為我論輩次，恰是兄弟行也。繩祖曰，君言信也。」筆者未免贅述，因此在引述小說〈三世英雄傳〉和〈新蕩寇志〉小說內文時，僅在引文最後或註釋標示〈三世英雄傳〉（第幾回）與〈新蕩寇志〉（第幾回），以下皆同。

52 田川思明這個人物雖是謝雪漁虛構的，但是其仍與史實相關。當時鄭芝龍與肥前平戶藩武士田川左衛門之女生下長子鄭成功與次子鄭宗明，鄭宗明的確後來被留在日本，鄭成功被鄭芝龍帶回中國。參見許海華，〈鄭永寧與近代中日交流〉，《近代東亞海域交流史》（台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2010.12），頁216。

53 〈三世英雄傳〉（九十七）。

> 人謂日本人中多有為支那人流寓者之子孫，今觀徐君田川君之事，足以證之而有餘。（〈三世英雄傳〉（八十六））

此言可解釋他之所以命名小說為「三世英雄」之因。因為故事裡的角色，不但是個為國盡忠的英雄，其先世也是在中、日、台英雄榜上赫赫有名的人。筆者認為，從這裡可以瞭解，謝雪漁並沒有把日本人看成異族人士，反而認為其與中國血脈應有相連。更重要的是，謝雪漁將中、日血脈連結的設定，是謝雪漁企圖傳達出中國人與日本人是出於同種族的概念。這個中、日同種的例證，在〈三世英雄傳〉中更發揮成中、日應相互融合的連結，容後詳述。

謝雪漁為何要將小說背景設定在德川末造，到明治維新初期這段時間呢？德川幕府到慶喜主政時，已經是空有虛名的將軍。當時日本原實行鎖國的封建經濟制度，不過荷蘭與英國已經開始與西南部沿海的藩主接觸並進行貿易，而這些藩主在得到金錢之後，便向國外收購大量的武器。1852年美國派遣海軍培里到日本，引發「黑船事件」。此時，開始有人向德川幕府建言開國，第二年日本被迫簽訂〈日美親善條約〉，西方其他國家紛紛跟進，這時土佐結合長洲、薩摩等藩，企圖要德川慶喜「大政奉還」於天皇。德川知道大勢已去，便將統治權還給天皇。這段面臨內憂外患的歷史，正符合謝雪漁想要強調亂世出英雄的背景設定，尤以西方進攻日本的歷史，展現西方列強對於亞洲國家的野心，更可從中理解西方與亞洲如何產生衝突。

再者，以該時期為故事寫作背景，更可以彰顯統治者推廣新學，讓讀者在閱讀小說之餘，有擺脫舊有文化，追求文明進步的企圖。小說中推廣新學的言論，如第十回借朱懷仁之口，傳達歐洲政治民情的描寫最為明顯：

> 法王拿頗侖第一雄視歐洲，各國畏之。普王當得力威廉第三，自恃兵力，足與拿頗侖抗，拿頗侖追之，王割地獻銀九萬億請和，拿頗侖第一以十萬軍責普供給。據普六年，民不鑰其政，英奧助普攻法，法潰奔，地復歸者，後王崩，富得立威廉第四立。不勤國政，各國侮之，另威良第一立，雄武有大略，俾思麥為相，既與奧國戰而勝，遂聚兵五十萬，

> 王與太子親征，俾思麥，福思倫，毛爾格分三軍至萊茵河，與法軍大戰，拿頗侖第三敗走，普太子追之，拿頗侖第三脫佩劍降，王命送諸黑西，獲法人八萬四千悉押赴日耳曼囚之。乘勝至巴黎，發巨礮攻城，圍一百三十二日，法乃割地償金，為城下盟，償款多至英金二百兆磅。王歸柏林，舉國鼓舞，二十四小國悉從命，奉為共主，是役普國兵士之死者亦不少，尋開新議院，定憲法，各州內政，仍自掌之。而普王則世踐帝祚，總攬政權，置聯邦議會，及帝國議會，使參與樞密，徵全國人民充兵役，又整齊郵政電線貨幣度量衡等制，使定於一。伸展小民權利，孳孳變通，國以大治。……其商務現極力振興，欲與英並駕齊驅，德政府按十年後，其貨物之輸出於各國，必壓倒英貨，務取工省價廉，其商戰手腕，極為靈敏，我國宜取倣之。（〈三世英雄傳〉（五十三））

這段描寫普法戰爭時期拿破侖如何進攻德國，以及德國如何戰勝法軍、成立新政府，並成為商業與海權強國之事，以教科書的方式描述得相當詳盡。筆者認為，小說設定的年代背景，與描述歐洲的建國史，呈現出謝雪漁想將真實歷史知識改寫進通俗小說的痕跡。

從〈三世英雄傳〉命名到故事的內容，筆者認為謝雪漁試著傳達下列兩點含意：一為中、日人血緣相同的同種論調，同血緣者應該要彼此合作友好，才能抵禦西方對亞洲的侵略。再者、西方列強對亞洲野心勃勃，非要學習他們的文明才能與之抗衡。筆者認為謝雪漁把這篇小說視為一個工具，藉由歷史知識和東亞論的框架，以情節加以渲染，透過文字將中、日同文同種與共同交好，以抵禦西方的觀念傳達給讀者。以下緊接著再以另一篇三〇年代的小說〈新蕩寇志〉來看，謝雪漁在三〇年代又在小說裡傳遞了什麼樣的觀念？再合併來觀察謝雪漁如何詮釋東亞論與其認同問題。

（三）〈新蕩寇志〉故事概述及其東亞論意涵

小說〈新蕩寇志〉的背景，[54] 設定在文永初年（1260年左右）鎌倉幕府北條氏執政時期，當時正值六波羅南方與北方勢力對峙之時，[55] 除了朝政內部分派之外，在民間有叛黨梟黨與鯨黨作祟，而元朝也企圖結合高麗攻打日本。[56] 故事以林明郎與張大郎兩人遭遇為主，兩人均為武士隊隊長，共同學武於林明郎的父親林次郎。只不過兩人各自擁主，因而立場對立。在一次意外，林明郎遇到鯨黨中內老人的孫女綾浪，兩人相戀，而綾浪的祖父中內老人本是反對北條家勢力的官員，因失敗後改在海上建立自己的王國。所以，在這個小說中的叛黨並非真正的搗亂者，反而是忠君愛國的人，只是所支持的政黨勢力與當政北條家勢力不同。[57] 故事以鯨黨中內老人的孫女綾浪探尋蒙古侵日的目的後，為保護日本叛黨的首領中內老人施法術招大風協助官方平定蒙軍作終。

---

54 〈新蕩寇志〉於昭和11年（1936）1月24日開始連載，連載到同年8月12日，共連載一百五十次，有一百四十九回，加上後有一「附錄」說明寫作該小說的主旨。本文僅詮釋〈新蕩寇志〉之所以命名「寇」的背景，關於小說名有個「新」字，而這個「新」與中國的《蕩寇志》有何關連？未免造成本文焦點模糊，筆者已另文解決。

55 所謂「六波羅」是指「六波羅探題」。當時皇室本反對北條氏勢力而起兵，在日本史上稱為「承久之亂」。「承久之亂」皇室一族敗給北條氏的勢力，因而皇族、親王等皆被流放，當時北條氏擔心皇族餘黨會再作亂，因此設立新選組的武裝勢力，在京都一帶監控皇族的行動，並僅聘任北條家族的人擔任要職。官職本只稱「六波羅」，後來因北條氏迷信佛教，所以再加上「探題」的雅號，因而稱為「六波羅探題」。而當時在鎌倉幕府（1192-1333）垮台後，1272年幕府正歷經二月騷動，當時北條時宗與其異母之兄北條時輔進行權力鬥爭。謝雪漁按照史實來設定的兩位主角林明郎與張大郎分屬兩個對立勢力。南北政權相關資料參見小倉和夫著、陳鵬仁譯，《中國的威信・日本的矜持》（台北：星定石出版社，2002.06），頁128。

56 正嘉2年（1258年），蒙軍將高麗崔氏政權消滅後，蒙古便派高麗使者到日本，希望日本臣屬蒙古。文永5年（1268年）忽必烈派遣使者到九州的大宰府（掌管九州外交、國防的官職），目的是為了向日本示好，要求日本斷絕與南宋的貿易關係，以削弱南宋經濟，進而消滅南宋。然而因北條氏當時任用許多南宋僧侶，據說這些僧侶為了保護南宋，以致於傳遞錯誤的訊息給北條氏，忽必烈後來又五度派遣使者來日，皆被拒絕。在文永11年（1274年）蒙古以高麗軍隊為先鋒，從九州博多登陸，當時蒙古軍的兵器皆塗上毒藥，且蒙古軍隊皆驍勇善戰，因此日本士兵相當害怕。後來據聞天亮海上刮起一陣大風，蒙古軍就潰敗了。河合敦著，陳念雍譯，《圖解鎌倉室町時代》（台北：城邦出版社，2006.06），頁94-95。另外，蒙古大規模入侵高麗時間是1231年，爾後大約三十年間，蒙古與高麗前後打過七次戰爭當時高麗內部對蒙古的入侵存在反對交戰，與堅持抗蒙兩派。1258年崔氏政權首領被文派殺害後，翌年（1259）蒙古與高麗達成和平協議，同意保留高麗的國家主權和傳統文化，高麗首都則遷回開城。忽必烈即位後，高麗成為蒙古的藩屬，後設征東行省，高麗國王兼任行省達魯花赤。而高麗君主從忠烈王開始便娶蒙古公主為妻，高麗君主繼承人按照約定，必須在元大都以蒙古人的方式長大成人後，方可回高麗任職，當時高麗上層社會在用語與服裝上有呈現蒙古化的趨勢。所以在史實上，高麗與蒙古的關係較日本深遠。而日本幕府曾在文永12年（1257年）準備攻打高麗時，於弘安4年（1281年）進攻高麗之前，遇到了蒙古軍隊來襲之事而作罷。

57 另一黨羽「梟黨」在小說中描述情節較少，主要著重於中內老人等「鯨黨」的描繪。

從〈新蕩寇志〉的內文及「附錄」提到的書籍，謝雪漁應該是根據賴山陽《日本外史》，[58] 並佐以《北條九代記》[59] 加以改寫的。[60] 謝雪漁在發表小說之前便曾在《台灣教育會雜誌》和《台灣日日新報》中刊載他閱讀賴山陽的《日本外史》的心得，其言：

殿軍三百護青工，失道鹽津大雪中，逢賊凍飢難一戰，植刀伏死盡全忠。[61]

詩中呈現他對歷史人物盡忠行徑的讚譽之情。筆者認為謝雪漁書寫〈新蕩寇志〉，應是延續賴山陽《日本外史》以為國盡忠英雄形象所改寫的小說。

作者為何要命名為〈新蕩寇志〉？[62] 為何稱「寇」？這裡的「寇」指的是「元寇」。日本稱犯日事件的蒙軍為元寇，[63] 爾後在日本只要提到「元寇」指

58 賴山陽《日本外史》分上下兩卷，印製時間不同，關於「源氏後記：北條氏」位於上卷第168-218頁，全文以日文寫成，內容中賴山陽也以「外史氏曰」的來呈現他對人或事情的看法。筆者比對賴山陽《日本外史》「源氏後記：北條氏」與謝雪漁〈新蕩寇志〉的內容，兩則著重有所不同。故筆者認為，謝雪漁應該不是全然參考《日本外史》。賴山陽，《日本外史》上卷（日本東京：春陽堂書店，1936）；賴山陽，《日本外史》下卷（日本東京：春陽堂書店，1938）。

59 提到《北條九代記》的內容在〈新蕩寇志〉（百十二），《台灣日日新報》，1936.06.16，8版。

60 〈新蕩寇志〉（百五一），《台灣日日新報》，1936.08.12，8版。「據賴山陽所著日本外史記載如此。某野史云，是年閏月，忽有大風〇起，非獨天時之變異，殆有神助之者，或云，中內老人以其仙術召雷柳風神合作之者。是亦不知其然不然也。」

61 謝雪漁本於《台灣教育會雜誌》刊載〈讀日本外史詠諸名臣〉，30號，1904.09.25；後又於《台灣日日新報》連載三天，分別為明治38年（1905）3月9日（2053號（1版））；3月10日（2054號（1版））和3月11日（2055號（1版）），不過《台灣教育會雜誌》的內容少於《台灣灣日日新報》數首。在《台灣教育會雜誌》上三屋清陰曾以「昔王仁以韓人為我帝師，善國歌，今謝秀才以新國民詠我古忠臣，抑亦王仁之匹儔也。」評論該詩。

62 〈新蕩寇志〉之名與清代俞萬清所著的《蕩寇志》名稱似有續衍的意味，為免失焦，筆者將專文處理此問題。

63 筆者查詢日本於何時開始有「元寇」的稱呼？根據《台灣日日新報》顯示，「元寇紀念碑」工程於1902年1月開始在福岡一地建設。另外，日本福岡市博多區東公園有一「元寇史料館（平假名：げんこうしりょうかん）」是一座存在於日本福岡市博多區東公園內的博物館。該館於明治37年設立，原名為「元寇記念館」，到了昭和61年被確定為「元寇資料館」。由日蓮上人銅像護持教會維持管理。該館展示室由元寇記念室與日蓮宗史、銅像史、武具的歷史、企畫展示的二室組成。內部陳列元日戰爭之際虜獲的元軍武器等貴重資料。與元寇有關的矢田一嘯畫家作品展示。還有甲午戰爭中繳獲的清軍物品以及青島戰役中的戰利品。另外，關於「元寇使跡」的相關參觀地有：「生之松原元寇防壘」位於福岡市西區生之松原、「今宿元寇防壘」、「今津元寇防壘」、「西新元寇防壘 百道元寇防壘」和「妙樂寺」位於福岡市博多區御供所町13-6。筆者本文分析的〈三世英雄傳〉中有提到了「元寇歌」（元寇（げんこう）は），該歌發表於1892年，由作詞 作曲永井建子創作。「元寇」相關資料資料參考有三：（1）旗田巍著，《元寇：蒙古帝國內部事情》（日本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2）《台灣日日新報》，1902.01.26，04版。「元寇紀念碑第二工事の著手」該碑立在福岡東公園地內。（3）參見日本福岡、博多的觀光網頁介紹（中文版）：http://yokanavi.com/tw/landmark/keyword/23

的就是當時犯日的蒙古軍。

不過，曾經是中國人的謝雪漁，為何會站在與日本相同的立場，稱曾統治過中國的「蒙古」為元寇？筆者認為謝雪漁之所以會稱為「元寇」，是以漢民族為正統的角度來看待元朝。在中國歷史或中國文學史上，元、清時期皆屬於異族統治時期。在日本關於蒙元時代的研究大致上也分成兩種立足點，一是將遼、金、元等異民族看做是統治中國的非漢族王朝，視其為「征服王朝」。二是將蒙元視為與宋元、元明般的「專制王朝」，單純視為中華王朝交替論。[64] 筆者從過去史家對於元、清二朝的看法，來推敲謝雪漁會寫「元寇」之因，是因為他以漢民族為中國政權正統的立場出發。[65]

但是筆者好奇的是，謝雪漁怎麼會不約而同的與日本同稱元朝為「元寇」？難道謝雪漁沒有任何矛盾嗎？筆者想藉由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論」，來推敲謝雪漁的想法，岡倉天心曾言及：

> 中國文明在元朝由於外族入侵，將自己的文化藝術喪失殆盡，印度文化也因回教徒和利益薰心的歐洲人破壞，失去往日的光彩。所以現在能繼承亞洲豐富歷史並對其進行一貫深入研究的只有日本。[66]

這段話是以日本為本位，所提出的文化正統論。這裡清楚的看出岡倉天心將中國文化、印度文化與日本文化視為同一源頭，這就是岡倉提出的「一體」。而謝雪漁在〈三世英雄傳〉接受中、日同種族看法，在〈新蕩寇志〉中接受中、日同文的觀點，筆者認為謝雪漁就是接受了中、日文化同源且為同一種族的「一體」，才能讓他迅速接受日本這個新統治者。而且岡倉文中強調「中國文明在元朝由於外族入侵，將自己的文化藝術喪失殆盡」的言論，是將元朝排拒

64 關於日本對於元蒙的研究，請參考內田直文、王毓雯，〈日本近年蒙元時代史研究：以文化政策為主〉《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期（2010.12），頁266。

65 沈松僑在〈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一文中提到，「晚清振興史學產生反滿和保皇兩派，此時反滿派建構的民族英雄是站在漢民族對異己族群的排拒與抵抗。」因此除了漢民族之外，皆屬於異民族。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集刊》33期（2000.06）。

66 史桂芳，《「同文同種」的騙局》（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12），頁13。

在「一體」之外的看法，這看法正好與謝雪漁的政治正統觀不謀而合。因此筆者認為謝雪漁在〈新蕩寇志〉之所以稱蒙古軍隊為「元寇」，是恰好與日本稱「元寇」的名稱相符，但是各自對「元」的認定還是有所差異。日本是站在抵抗的立場稱元為寇，謝雪漁是站在漢民族為中國正統政權的立場，稱元為寇。

另外，筆者為什麼以岡倉天心的「一體」來推測謝雪漁的想法呢？筆者認為謝雪漁之所以在小說引用東亞論的觀點，是站在岡倉天心提出中、日為同文一體的論點上，就是因為他認為日本與中國文化同源，才會站在與日本相同的立場來看「元朝」，因此在小說中才會有「元寇」的稱呼。這也可以理解謝雪漁為什麼可以接受賴山陽在《日本外史》的觀點，認為犯日的蒙古軍是「元寇」，這是因為他是站在漢文化本位的立場去思考元朝的存在。

除了對「元」的看法之外，筆者還在〈三世英雄傳〉中找到他合理化新統治者（日本）的解釋：

> 支那歷朝革命，其事新朝者，則為新朝謀，事舊朝者，則為舊朝謀，各忠於所事。亦以身受其恩，義不容辭耳。彼同居支那境土，以所事主之異，其所為尚如此，況我等已居國土之異者乎，為日本謀者，何待於言。（〈新蕩寇志〉（八六））

這段話表示，支那經歷過改朝換代時期，雖然居住在同一個國度，但是有人因支持的領導者不同，而有了不同的政治立場，更何況是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呢。筆者認為上述引文呈現出謝雪漁對同種族、同文化或為同一國的人民，有不同的政治立場這件事覺得很平常，這也表示，他之所以迅速接受日本這個新的統治者，且合理化新統治者的存在，是因為他認為中、日為同文同種的「一體」，而他的政治立場只是隨著統治者更迭而自然轉變的。

〈新蕩寇志〉除了有同文的例證外，其中也有傳達中、日同種血緣論的例證。〈新蕩寇志〉主角林明郎的徒弟秦虎，之所以命名為「秦虎」，正是因為父親秦雄本是中國人，並在唐朝天寶末年渡日，在日本生根，而家傳的符法也屬於中國傳統的道法之一。這段以秦虎出自中國的血脈，和日本受中國（唐

朝）文化影響，也是謝雪漁提出日、中出於同種族、同文化的證據。[67] 筆者引用〈三世英雄傳〉中日人留學生長雄對支那留學生的說法，恰好可以解釋謝雪漁對於中、日關係的想法：

> 我等均住亞洲，人種同，文字同，且此後所學亦同，或同在一校研究，亦未可知。此後願與二君深相結契，永為知己。（〈新蕩寇志〉（六四））

上述呈現出謝雪漁如何看待中、日兩國的關係，其立基於居住地域相近，彼此出於同種同文化，所以應該彼此交好的基礎。從〈三世英雄傳〉內提到的同種族血緣論，[68] 到〈新蕩寇志〉中的唐朝人移居日本的證據，[69] 在在都呼應著東亞論中強調中、日可以連結，在於彼此同文同種的基礎。而且小說中以徐福、鄭成功和朱舜水三人做為中、日同血緣論的證明，最主要是這三個人在中國（台灣）歷史上具有相當的正面形象，若要東亞論順利被殖民地台灣人民所接受，彰顯鄭成功等人對台灣與中國的貢獻，是個可以被巧妙運用的歷史證據。這些歷史人物經由謝雪漁的詮釋，變成了合理化日、中的臍帶，巧妙的連結了日本人、支那人與台灣人的歷史與血緣。其實這樣的血脈連結，對於日人來說，是建構日、中、台同文同種神話很重要的證據，這不但可以合理化日、中是同種族的神話，也能達到與中、台人靠攏的目的。

除了出於同種族證據外，中、日同文的立場從〈新蕩寇志〉北條氏對支那學問著迷的說法，也可以提出證明：

> 此時我國何以全無意氣，因舉國朝野，沈溺於支那之學問，與支那之佛教迨源氏起。創設鐮倉幕府，日本精神旺盛，支那之學問與佛教，渾融為一……我國溺於支那之學問與佛教，約五百二十年間，頻受外侮……（〈新蕩寇志〉（八二））

67 〈新蕩寇志〉（五八）
68 〈新蕩寇志〉（八五）
69 〈新蕩寇志〉（五八）

文中批評以北條氏耽溺支那學問與佛教，而造成鎌倉以後日本國勢積弱不振的狀況。佛教思想從鎌倉（1185-1333）到室町的時代（1336-1573）皆為日本官學，佛教思想不僅受到將軍、朝廷與守護大名的愛戴，而且五山禪僧經常參與軍政機要，直到德川時期才試圖將佛教勢力結合儒學勢力，慢慢轉變成以儒學為主的忠君思想。[70] 更重要的是，對日本來說，儘快的掌握佛教，不僅可以躋身先進國家行列，還能使國內臣民俯首聽命，可謂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71] 所以，謝雪漁批評支那佛教帶給日本政壇負面影響，應該是謝雪漁從歷史演變的結果所進行的論斷。因此，筆者認為謝雪漁雖然認為支那與日本出於同文同種，以這段文字來看，反而突顯出謝雪漁藉歷史結果對支那文化進行貶抑。但是，日本朝政的盛衰到底是不是佛教所影響的，這已不是謝雪漁所想要深入理解的範圍。筆者認為這兩篇小說中，一面建構日、中（台）同文的連結與同種族神話，卻又傳達支那文化帶給國政治理的負面影響，這樣矛盾的情節，謝雪漁應有其操作目的，筆者也試圖在〈三世英雄傳〉中找到線索：

> 以同洲共種之誼，宜與之深相結納，彼此他日當國，其相援助之處必多，一郎亦曰，現時歐洲各國，皆思擴張勢力於我亞洲。在亞洲立國者，論疆域之廣，人民之眾皆不如支那，其國勢今雖積弱不振，然將來與我國協力同心，以禦歐洲人勢力之東漸者。非支那人不能，與之結納誠不可不為之。（〈三世英雄傳〉（六五））

謝雪漁一邊將中、日血緣提出連結的證據，一面又顯示支那文化帶來的軟弱性格，其實是想要突顯，若想維護亞洲的主權，並且抵抗西方的侵略，同種族的日、中聯合是很重要。

再者，小說不僅連結中、日血緣與文化，也曾提及日本與高麗（韓國）的淵源：

---

70 張崑將，《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之王道政治》（台北：台灣大學出版社，2004.08），頁35。
71 米慶余，《近代日本的東亞戰略和政策》（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08），頁8。

> 高麗與我國，原親若兄弟，因中外國反間，同室操戈，幾次交戰。在距此約六百年之昔，我國及高麗聯軍，與大唐之師戰，大敗。高麗遂與我日本分離，直置於今，凡有自支那大陸來襲者，我國皆不能為高麗援助，其問我國所受損害，亦殊不少。（〈三世英雄傳〉（八十一））

這段寫出韓國與日本原本的關係，直至敗於唐朝大軍才被迫分離，成為中國的藩屬國。在此也強調高麗與日本地理位置相近，若彼此不互相幫助，則會造成雙方國勢失利的狀態。這裡謝雪漁特意強調鄰近國邦交的重要性，尤其以日本、韓國為最。由此歸納來看，小說中不但顯示出謝雪漁在小說中傳達日、中（台）同種族的目的，也間接傳達日人對中國、韓國的政策。謝雪漁傳達日、中血脈的連結，建構了東亞同種族神話的特性，從中還間接以歷史，傳達日本想要結合東亞的力量的目的。從中、日為同文同種的連結，到謝雪漁小說設定中、日韓三地彼此相互協助的融合論來看，雖然筆者沒有找到謝雪漁接收東亞論直接的證據，但是，從同文同種的詮釋和地理範圍界定與前述「東亞」地理範圍相同，筆者認為謝雪漁是站在東亞論的基礎，也就是建立東亞融和的觀點，要一同聯合東亞對抗共同的敵人「西方」，以維繫東亞利益。筆者認為這兩篇小說傳達西方（或蒙古異族）為亞洲的外敵，亞洲必須解除內亂，一同對抗外敵，雖然各國各擁其主，但是抵抗外敵的立場應是一致的。這是謝雪漁心中建構的，東亞和平理想家國的形象，也是謝雪漁之所以能很快的認同日本政權的原因。當然，小說裡對中、日、韓結合所創造的理想家國寫照，與實際歷史是不符合的，例如小說中提到的日韓平和的兄弟關係，事實上日本對韓國的征討是連年不斷。[72] 這也是筆者在此強調日本建構的東亞論，對東亞各國來說只是理想家國造象的原因。下節筆者將試著以小說內容繼續證明我的論點。

---

72 歷史上日本征戰韓國的紀錄不少，朝鮮一向都被視為日本實現大陸擴張政策的突破口和跳板。日本征韓最有名的當屬1591年（天正19年、中國明萬曆19年）豐臣秀吉攻打韓國的「文祿慶長之役」，當時是由中國出兵援助，才平定日本征韓之事。所以謝雪漁這段強調日本與韓國親若兄弟的關係，並非史實。閻京生，《菊花與錨——舊日本帝國海軍發展史》（台北：知兵堂，2007.04），頁52。

四、從戰爭描寫建構東亞融和理想家國見謝雪漁認同

從上節筆者試著詮釋謝雪漁在小說中建構的東亞論，以及提出他為何能迅速接受新統治者的證據後。筆者試圖在本節，繼續分析謝雪漁如何從日本歷史上的內亂、對外戰爭的描繪，建構出理想家國的模型，而這個模型正符合東亞論所欲建構的，理想的、融和的、共有的家國，從中再來觀察謝雪漁的認同問題。

在〈三世英雄傳〉中描繪了兩次內亂。第一次是幕府末期開國黨與鎖國黨的對峙。主角徐一郎的父親曾表明當時日本走向開國，已經是不可避免的局面。這段歷史的描繪，呈現明治維新前日本內部的狀況，以及西方世界對日本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透過明治維新前期日本受到西方影響，傳達出世界各國間已經處於彼此相互牽引的局面。另一個內亂的描繪，小說中僅以西鄉隆盛（1828-1877）等人提出征韓論，進而引發內亂幾個字輕描淡寫的帶過。真實的歷史狀況是，明治維新時期的朝鮮仍是中國的朝貢國，在幕府末期一直有征韓的言論出現。當時是由木戶孝允（1833-1877）等提出「征韓論」，雖然日本內部一直有征韓的企圖，但是時間點卻遲遲沒有定案。1871年12月，日本政府向西方派出了以岩倉具視（1825-1883，政治家）為首的維新志士前往西方考察，並企圖修正過去西方與日本間協定的不平等條約。後來，木戶孝允(1833-1877）等人在見到外國實力後，決議暫緩征韓，以穩定內部實力為先。這時候西鄉隆盛等人仍決意征韓，最後，內政穩定派大久保利通（1830-1878，政治家）掌握政權，平息征韓的意見，主戰派西鄉等人最後只得退隱，征韓一事便無疾而終了。[73]

另外，在〈新蕩寇志〉中的戰爭描繪，主要放在如何瓦解外患蒙古的勢力，以阻止蒙軍侵略日本的戰略上。歷史上元日戰爭是元朝皇帝忽必烈在1274

73 同上註，西鄉隆盛為倒幕軍參謀，與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三位在幕末變局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並稱「維新三傑」。但是在「征韓論」之爭中，三位產生了意見上的分歧。「征韓論」之爭實際上是日本政府內部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政治集團的一次衝突，舊武士代表西鄉試圖以發動征韓來緩解幕府末年士族階層的窘境，提高其政治地位。但是資產自由派的坂垣退助卻想將國內注意力轉向國外，推行資產階級民主改革，所以雙方便以此事引起爭論。後來西鄉被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借「征韓論」搞下台，回鄉後在鹿兒島建立了幾近獨立的個人王國，終以發動西南戰爭，兵敗後以自殺告終。「征韓論」之爭，實際上是日本政府內部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政治集團的一次衝突。閻京生，《菊花與錨——舊日本帝國海軍發展史》，頁22-23。

年和1281年兩次派軍攻打日本而引發的戰役。第一次蒙古侵日稱為「文永之役」，第二次為「弘安之役」。這兩次侵日儘管均以失敗告終，但是小國日本能抵禦蒙古帝國，也對蒙古大軍產生不少挫折，造成當時蒙古對外擴張行為逐漸銳減，此事也是日本形成國家概念很重要的事件之一。造成元軍不戰而敗的原因是，元軍攻日的船隻遭到暴風（小說中講的神風），兵力損失眾多，此事在小說中渲染成中內老人施法術造神風而助抗元之事。

上述將兩篇小說中內憂與外患的戰爭情節作初步說明，雖然二者僅有〈新蕩寇志〉對戰爭場面的描述較多，但是，戰爭卻是創造兩篇小說寫作內涵很重要的背景。兩篇小說的背景是日本建國以來很重要的戰役，經過這些內憂外患的戰爭，造就日本民族以小搏大的性格。戰爭描繪對峙的時刻，也突顯出小說中的英雄主角智、能、勇的特質。透過英雄開國的不易，強調出國家意識，如主角徐一郎之父徐士奇言道：「吾以身許國，為國而死，吾分也。」[74] 文中更引用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青。」[75] 呈現出在二世[76] 為國盡忠，一切以國為主的勇氣與英雄應有的氣度。另外，在智慧方面，英雄呈現出洞察先機的遠見，如：

> 現已有數國通商，派遣公使駐劄。而全國人心，皆主排外，倘有不識時務之輩，妄殺外國一人，必開兵端。我國人勇猛性成，不甘屈於人下兵連禍結，實非國家之福。（〈三世英雄傳〉（六））

這裡呈現出日本人性情勇猛，不甘居於他國人之下的特質。另外小說中特意呈現日本與西方國情不同，以提醒留學生不得感染西方惡習，展現出日本較他國人種優越的主體性：

> 我國政體與外國不同，以忠孝義勇為本。所謂武士道者，國粹不存，則

74 〈三世英雄傳〉（十四）
75 〈三世英雄傳〉（十四）
76 一世指的是移居到日本徐福及五百童男童女。

> 國家必覆，切不可因處彼之都染彼之俗，與彼同地，擇善而從斯可矣。為軍人者，鍊就強健體力，乃堪任務，故保健之道，時常留意，又宜持沈重態度，稍涉輕浮，則易憤事。（〈三世英雄傳〉（四三））

這裡強調西方與日本國情間的差異，雖然西方有可仿效的文明物質，但是在學習文明之餘，保留日本民情、國風，才可以保留身為日本人的主體性。這種言此貶彼的說法，在在展現身為日本人的優越感。

另外透過戰事的描繪，也讓小說中內不斷地出現忠君愛國的話語，如女主角之一的菊芬曾表示：

> 妹讀書明理，忠孝之事，常繫胸中，恨我生為巾幗，不能出仕朝廷，與兄騎驅並駕。振起家聲。（〈新蕩寇志〉（四））

這裡凸顯在國勢紛擾之際，女性也願意報效國家之心。還有，故事主角林明郎雖一再表示他著重修練不問世事，但他仍願意以國為重。這裡林明郎隱居，著重修練不問世事的行為，筆者認為與中國陶淵明歸園田居的態度不同，他應與日本武士隱居的習慣有關。為什麼要隱居呢？因為武士地位是世襲的，如果敵對地位的張大郎要娶他妹妹，按照武士的規則，林明郎是不能認同的，是需要與張大郎一決生死以維護自己的地位，因此武士間避免殺戮最好的辦法，就是林明郎自己先行隱居，一方面退位，象徵讓位給張大郎；另一方面也隱含他認同張大郎這個人，[77] 因此在國難當頭之際，他願意結合敵對張大郎的勢力，為國家盡心的態度。是呈現為國盡忠可以拋棄自我的表現，其言：

> 翻稽古史，未有不忠不孝不義之徒，得證仙班者。此次國家有難，我亦

77 日本武士的隱居行為可見林景淵的研究成果。「隱居」最早見於《續日本紀》（延曆2年，783年），當時隱居是指公家辭官退隱，後來在《難太平記》（1406年）隱居就已經有讓位的含意。因為〈新蕩寇志〉中林明郎並沒有完成辭官職的動作，加上武士與武士若是站在像林明郎與張大郎這樣政治立場敵對的位置，勢必要以戰鬥來解決問題，筆者才會認定林明郎後來因為流浪，再來隱居練仙術是為讓位，主要是立基於武士戰鬥地位的特性，與武士隱居本身是為了減少家族成員的糾紛背後的意義，才下此判斷。林景淵，《日本武士道之研究》（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社，1993.06），頁118。

不能不再一出戮力，以待事平再來。（〈新蕩寇志〉（百廿四））

文中他認為國家有難，要先完成對國家的責任，才是忠義之徒應有的表現，這是高道德標準下的英雄人格寫照。若說〈三世英雄傳〉的戰爭書寫呈現了東亞論的理念，凸顯了日本人尚武、不屈就的主體性格，以及建構了具備智、能、勇的英雄模範。以戰爭為主要描繪情節的〈新蕩寇志〉，更透過與外敵實戰的對峙，凸顯了戰爭書寫的價值。而且，這種為國盡忠的觀念，充斥著整部小說，非主要角色的中內老人，原是反對執政者北條氏勢力的頭目，也在面對外敵時表示：

我以為蒙人猖獗，侵我疆土，乃我日本國之公敵，非北條氏之私敵也。鎮西諸將既出，我軍只好沿岸集結，徐察形勢。如其勝也，吾黨縱船邀擊，劫掠輜重，以充軍實。所謂坐收其力如其敗也。吾黨全隊俱出，截殺敵軍，使他不得大逞其志，是亦有助於國也。（〈新蕩寇志〉（百卅八））

這裡以「公敵」、「私敵」來區分出二者在內政上立場不同，但是內部紛爭絕不影響面對外敵時，一致對抗外敵的情操。戰爭意味著自我尋求保護與種族是否能延續的關鍵時機，對人民有著生死存亡的嚴肅意義。所以，儘管對北條氏政權相當不滿的中內老人，仍願意拋棄成見，與北條氏共同抵禦外敵。這種上下一心的愛國氛圍，在〈新蕩寇志〉另一個主角張大郎身上也可見到，如：

北條時輔本欲在蒙古欲犯日本之時倒幕府，但是大郎表示：幕府倒而日本國與之俱倒。因為大郎所言：蒙古通牒，既為我國古今未曾有之大事，自應舉國上下，同心協力，臨機措置，不得以此外交問題，利用於內政紛爭。（〈新蕩寇志〉（卅一））

這裡也呈現出面對外敵上下一心與全民動員的姿態。既表達個體愛國的意念，也呈現社會上不分你我的愛國表現。三〇年代書寫的〈新蕩寇志〉已不像〈三

世英雄傳〉僅以傳遞東亞論概念為主，小說中充斥著戰爭場面的描繪，與英雄的行徑舉隅，可能與接近大東亞戰爭時期有關，因此小說內容會充斥團結人民，共同抵禦外敵為優先的言論。

而且，小說中透過戰爭假設國家外部敵人的存在，主要是為了對讀者產生強制性的效果，這個效果會隨著小說中戰爭的發展，完成向讀者傳播愛國的意識型態。這是利用戰爭書寫建構一個假想敵，透過他者的威脅，以剝奪人民的權利為恐嚇，以完成對讀者傳達國家機器意識型態的使命。而且，從政治學的觀點上來看，愛國意識是國家賴以生存發展不可或缺的精神基礎，所以〈新蕩寇志〉（百卅六）才會表示：

> 若逢明郎義兄，煩為道歉，謂家仇既報，國仇亦不可不復。又謂綾浪曰：若我義兄肯出，須令他先歸家省親，切勿直赴貴處。綾浪曰，忠孝宜兩全，拜母孝也，殺敵忠也，為家則孝，為國則忠，公私兩盡，乃可謂完人。

上述呈現林明郎與愛人綾浪可以安心入山修行，主要是因為他們已經完成保衛國家階段性的使命。所謂完人是要先完成為國盡忠，再來成就自我。當代著名政治家伊士頓也強調：

> 政治系統必須培養成員對所屬的政治社群，具有共同負擔政治命運的歸屬感及凝結意識。就國家層面而言，國家政治系統的維持，也必須培養大多數人民對自己國家產生認同感。[78]

從上述提到政治體系以建構全民歸屬感與凝結意識為先的方法可知，「認同」是建構在愛國情操的基礎下。那麼怎麼讓新附民迅速的建構愛國情操呢？筆者認為就像謝雪漁小說中的操作一般，透過抵抗外敵來重構歷史，以建構讀者們的認知，若小說缺乏外敵建構，就難以展開人民上下一心建國的故事情節，也

78 彭懷恩，《中華民國政治體系的分析》（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885.03），頁88。

就難以完成認同。

那麼為什麼筆者認為戰爭書寫與東亞論建構有所關連？子安宣邦表示東亞論是以對抗歐洲中心的世界秩序為目的論述，[79] 這個說法不是與戰爭書寫透過抵抗的歷史建構近代化國家的目的相似，所以，謝雪漁在小說中傳遞東亞論時，才會以日本對抗外敵的戰役為小說的背景。但是，這樣的對抗論仍有一中心存在，筆者以〈三世英雄傳〉（七五）提到元寇攻日行為來做對照：

> 思明接言曰，忽必烈實易絕代英雄，設此時東亞君主有如忽必烈其人者，歐人亦未敢侮我亞人若此。願與諸君共勉，以扶植東亞人種，大用繩祖均言甚善。

上述說明忽必烈的文字與「亞洲若有一霸主出現來統御亞洲，歐洲便不會侵略成功。」[80] 的論點不有些類似？這裡透過聯合鄰近國家成為「我」，在他者出現之時，「我們」亞洲各國應該消除國界，以同一共同體一起對抗他者，這種利用戰爭建構教化權力的政治性言說，以及東亞源同一人種，應一同建立起和平家國的理想，便是小說透過戰爭書寫，企圖讓讀者接受東亞是一個存亡共同體的概念。回顧第二節筆者所引述的「廈門東亞書院章程」，其言及「夫以亞細亞之大為全球所重，中日唇齒相依，宜早聯洽，以固邦基，以端教民。」[81] 的言論，二者不也相似。

從謝雪漁兩篇小說的內容來看，筆者推測，謝雪漁之所以藉由戰爭史的背景來改寫小說，其實是為了透過戰爭奠定英雄的道德與建構英雄標準，讓這些英雄高超的武術、過人的勇氣以及盡忠職守的愛國精神征服讀者，並體現日本人身體的強壯，和面對強大外敵不畏懼的勇氣寫照。我在此力圖呈現戰爭所帶來的愛國情操，以及英雄在面臨外敵時，帶有隨時為國盡忠的勇氣，與解決外敵進攻的聯合方法，是為了呈現戰爭將原本尋常的生活，在受外敵侵略而改變

79 子安宣邦，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頁14。
80 同上註，頁14。
81 《台灣日日新報》488號，1899.12.16，3版。

成一個充滿不安的政治張力場所。因為筆者認為主體性的呈現，非要有一個舉國上下共同的敵人才能被突顯出來，這也是東亞論一直強調的，中、日、韓聯盟對抗歐洲侵略的問題，也是小說中透過戰爭強調了外敵的位置，突顯出內部（東亞）必須團結的方法。只有亞洲內部團結一同抵抗外敵（西方），才能建構出理想家國的可能。筆者認為在這兩篇小說中，謝雪漁運用東亞論的概念，將戰爭的描寫到建構外敵出現的緊張局勢，並以同文同種的基礎，建構出的自我與他者的分別，以求中、日共同協力、融和的狀況，是為東亞共和理想家國造象。

謝雪漁為何想要為東亞共和的理想家國進行造象？筆者認為這跟他自我在尋找認同的歷程有關，也跟他之所以能接受東亞論，迅速認同日本政權有關。對於原本是被中國（清朝）統治的台灣人來說，日本在文化上、文字上皆有與中國共同的源頭可依循。若再以同種族的角度提出東亞論，對於謝雪漁來說，東亞論不但可以延續漢文化與種族的優勢，也讓殖民地人民變得容易接受一個「新」的統治者。因為這會給殖民人民一種文化錯覺。這也是筆者在閱讀《台灣日日新報》東亞的論點，以及閱讀謝雪漁小說中關於日本征戰史書寫時，推測出謝雪漁很早就能接受新統治者，甚至認同新統治者的原因。一方面是東亞論的提出，對於剛被新統治者接收的台灣人來說，那是個可以安心歸依的言論。他既可保存漢文化文化資本的優勢，又可建構日、支共和，最重要的是，可以讓使用漢字習慣的台灣人繼續保存漢字的使用，這對謝雪漁來說，不正是站在維護漢文文化資本的立場，藉以保存自己家國的理想。但是，謝雪漁忽略的是，人其實很容易在因地制宜的狀況下，對既存的事實、符號或象徵意涵進行自我合理化的重組。透過自我合理化的重組，進而創作出一個新的自我。那個自我自以為可以與權力協商，並盡可能將機會轉化為對自己形勢有利的詮釋角度，進而構成了自己新的認同，這個新的認同就是筆者在爬梳東亞論時，發現謝雪漁建構的理想家國形象。然而由於經驗物在尋找自我認同時，很容易不斷地被自我改寫，卻不自覺的改寫成為服膺統治者的政策工具。

五、結論

在《台灣日日新報》上也可見讀者對東亞論的回應。明治44年（1911年）3月18日的〈是是非非〉有讀者回應了大隈重信的言論：

> 敝人讀貴報東亞文明之融和論事，實獲我心，大隈侯其不失為世界偉人，獨能見奇大，夫東西洋人種有殊，彼為白種，我為黃種，色彩不同，文明之起源各別。我之所謂文明，彼未必以為文明，彼之所謂文明，我或不得以為文明。要之。藝術我當學彼，而道德則彼宜學我者。蓋形而上之學，彼不及我形而下之學，我不及彼。保我之長遠而採彼之長，所謂合歐鉛亞而冶之，別裂一奇器，更違一文明，不然將成一非驢非馬之文明矣，豈不哀哉。[82]

這段話呈現讀者對東亞融和論的支持，支持的原因是站在亞洲文化相近，彼此人種相同，進而提出亞洲融和以對抗歐洲文明全面移植到亞洲來的論點上。文中呈現出身為亞洲人種的主體性，以及對亞洲融和發展的期待。雖然不能直接知道該讀者的身份，但是從謝雪漁和其他人接受東亞論的狀況，筆者挪用陳培豐的說法來解釋東亞論可能會被台灣人接受的原因：

>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在文化上有明顯的重層性、親近性。例如漢詩文、漢字及儒學。……以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所共有的上述文化資產，都淵源於被殖民者。[83]

日本使用台灣人慣用的書寫文字：漢字，以及透過漢字作為聯繫東亞的工具，實際上很容易創造出台人（中國人）以為接受日本，是保存自己文化的角度，因而附和了日本人東亞論的觀念。

---

82 〈是是非非〉，《台灣日日新報》4239號，1912.03.18。

83 陳培豐，〈從教育勅語到台灣版教育勅語——近代日本的儒學、天皇制與殖民統治〉，「台灣遺民儒學：1644與1895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台灣儒學研究室主辦，2005.09.08，頁2）。

那麼接受東亞論的謝雪漁，為何要用歷史小說的形式來呈現東亞論，筆者引用竹內好的觀點來解釋：

> 歷史只有藉助於現在的主體才能存在，而且他只有當現在的主體具有了高度緊張的危機意識時，才能在瞬間展現，並使得主體進入歷史。[84]

竹內好表示歷史可以當作接近事實的客觀實在物，若透過知識加以凝固，歷史就會被知識化，在知識化的過程中，人們可以不斷地重新認識歷史、接受歷史，甚至改寫歷史。因此竹內好提出的「高度緊張的危機意識」的時刻，筆者認為在日本殖民台灣之時，正是台灣人喪失自我，以及自我有待形成的緊張時刻。正因為處於自我待建構的時間點，很容易對過去自我迷失，此時若新的歷史知識進入，就可以在讀者心中進行了改寫，主體就此被重塑成殖民者想要的樣貌。孫歌也對歷史提出這樣的詮釋角度：

> 所謂的歷史，在主體為了自我形成而拼搏的那一瞬間，產生了。這樣的歷史便意味著主體為了成為自己，甘冒失去自己的風險，亦即建立自我更新的流動狀態。[85]

孫歌認為主體在自我形構的過程中才會產生歷史，歷史才會具有意義。而且歷史是對現代具有意義，而不是對過去具有意義。因此現在對歷史的詮釋，比真正的史實來得重要。筆者認為，謝雪漁之所以引用日本的歷史，正是透過知識論建構的方式，試圖重新建構自我認同，並且將歷史改寫成通俗小說，也藉小說易被接受的方式，將他認同的觀念傳達給讀者。

本文試著將戰爭期（1937年）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概念的時間往前推演，爬梳在「大東亞共榮圈」概念提出之前，是否有類似的觀念，還有該觀念在台灣宣傳的內容。本文也透過台灣文人謝雪漁改寫日本戰爭史的小說，來理

84 同註17，頁177。
85 同註17，頁183。

解謝雪漁如何詮釋與接受東亞論，以及如何利用戰爭描繪，將東亞論的概念，形構成一個消除東亞國界的和平理想家國。本文藉此來理解東亞論在台灣推展的歷程，進一步理解台灣文人謝雪漁為何能迅速認同日本政權的原因。

筆者在剖析後得到下列結論，日本統治台灣時，正值西方向亞洲肆虐，與日本企圖在中國等東亞地區擴展其勢力的狀況，當時日本藉著《台灣日日新報》向中、台人民傳遞東亞論，以宣傳「東亞論」和認同意識。筆者從《台灣日日新報》的論述，歸納出戰爭期以前在台宣傳的東亞論，並從謝雪漁的小說，也發現東亞論概念的實踐。本文認為，這是謝雪漁在自我認同形構時，接受了對他的文化、種族延續有利的東亞論，並從他改寫的小說將東亞論傳遞給讀者的證明，也是身為輿論製造者的他對日本文化協力的證明。

參考資料

一、專書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06）。

小倉和夫著，陳鵬仁譯，《中國的威信．日本的矜持》，（台北：星定石出版社，2002.06）。

史桂芳，《「同文同種」的騙局》，（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12）。

米慶余，《近代日本的東亞戰略和政策》，（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08）。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稻鄉出版社，2010.06）。

李弘祺編，《中國與東亞的教育傳統》，（台北：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6.06）。

岡倉天心，《東洋的理想》，《近代日本思想大系7岡倉天心集》，(日本：筑摩書房，1976）。

林景淵，《日本武士道之研究》，（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社，1993.06）。

林慶元、楊齊福，《「大東亞共榮圈」源流》，（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11）。

松浦章著，卞鳳奎譯，《東亞海域與台灣海盜》，（台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2008.11）。

河合敦著，陳念雍譯，《圖解鎌倉室町時代》，（台北：城邦出版社，2006.06）。

柳茂坤、鍾慶安，《「大東亞共榮圈」之夢》，（中國山東：海南出版社出版，2006.06）。

孫　歌，《亞洲意味著什麼》（台北：巨流出版社，2001.09）。

張崑將，《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之王道政治》，（台北：台灣大學出版社，2004.08）。

許海華，《近代東亞海域交流史》，（台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2010.12）。

彭雙松，《徐福與邪馬台國》，（苗栗：富蕙出版社，1990.06）。

彭懷恩，《中華民國政治體系的分析》，（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885.03）。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台北：聯經出版社，

2011.03）。

旗田巍著，《元寇：蒙古帝國內部事情》（日本東京都：中央公論社，昭和56年）。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八卷》，（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59）。

衛挺生、王雲五《徐福與日本》，（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74.10）。

賴山陽，《日本外史》上卷，（日本東京：春陽堂書店，昭和11年（1936））。

———，《日本外史》下卷，（日本東京：春陽堂書店，昭和13年（1938））。

閻京生，《菊花與錨—舊日本帝國海軍發展史》，（台北：知兵堂，2007.04）。

J.M.布勞特著，譚榮根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09）。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內田直文、王毓雯，〈日本近年蒙元時代史研究：以文化政策為主〉，《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10年2期（2010.12）。

王惠珍，〈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虛與實：以龍瑛宗的文藝活動為例〉，《台灣學誌》創刊號（2010.4）。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集刊》33期（2000.06）。

趙勳達，〈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在台灣的興起與發展概況（1924-1937）〉，《國家發展研究》10卷2期(2011.06)。

（二）研討會論文

陳培豐，〈從教育勅語到台灣版教育勅語——近代日本的儒學、天皇制與殖民統治〉，「台灣遺民儒學：1644與1895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台灣儒學研究室主辦，2005.09.08）。

三、報紙文章

雪，〈三世英雄傳〉，《台灣日日新報》，1912.08.24-1913.01.10。

雪，〈新蕩寇志〉，《台灣日日新報》，1936.01.24-08.12。

黃守謙，〈送潤庵詞兄之福州〉，《台灣日日新報》5472號，1915.09.15，6版。

《台灣新報》，（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4年復刻版）。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4年復刻版）。

四、電子媒體

日本福岡、博多的觀光網頁介紹（中文版）（來源:http://yokanavi.com/tw/landmark/keyword/23）。
《黃氏族譜》，（來源:http://192.192.13.178:8088/html_show.php?sn=375&open_sn=384#top，最後查詢日期2011.08.07）。